

原創的力量與想象

鳳凰原創文學論壇聚焦「傳播力」



10月23日上午,2020鳳凰作者年會主題活動“鳳凰原創文學論壇”在南京舉辦

文學如何獲取原創性的力量與想象

一個显而易见的事实是,伴随着科技和媒介的发展,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文学的衰退期。我们是否还需要文学和阅读?

“文学会死吗?答案是否定的。因为,我们还在使用着语言,而文学就是语言的艺术。我们用语言讲故事,保持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特性、心灵世界、生活景观和想象能力,语言不死,文学就会永存。”著名作家、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说。他引用文学批评巨擘哈罗德·布鲁姆的观点,指出复杂的认知与审美过程所带给我们源源不断的惊异感,是今天还需要继续阅读与创作文学作品的首要理由。

邱华栋回顾了新文学走过的百年历史,指出中国文学是无数个中国人个体经验的表述,中国文学始终在与历史、国家,乃至世界进行对话,我们拥抱文学就是在打捞鲜活的当下中国。“我们书写什么样的文学就是在创造什么样的文化基因,我们阅读什么样的文学就是召唤什么样的心灵。我们今天仍然需要文学,既是为了克服历史健忘症,也是在重新体认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,更是要把个体的精气神汇入源源不断的民族文化传统中。”

浙江省作协主席艾伟,甘肃省作协主席叶舟分别从自身的创作实践出发,回应文学如何获取原创性的力量和想象。

被誉为当代人“精神的勘探者”的艾伟,其作品主要将“生命本质中的幽暗和卑微”作为叙事聚焦的对象。他认为中国的传统小说是有力量的,特别是在日常生活和日常经验的书写上达到了极致,但缺少对人的精神性想像。“《金瓶梅》里的世界和今天非常相似,在经验的层面几乎依旧概括着今天中国人的生活。可是,在《金瓶梅》里,我们很难找到西方小说中人的‘两难选择’‘灵魂的挣扎’等等这样对人的精神性想像。在《金瓶梅》中,人的选择是非常轻易的。”他认为,如何既能在文本中充分容纳中国经验,又和西方关于人的精神性想像和理解接通,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依旧是个难题,也是文学的价值所在。

在边疆工作生活30年,叶舟找到了自己写作的版图和词汇。以河西走廊为书写对象并获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10部提名作品的《敦煌本纪》,是他书写边疆的集大成之作。他认为,自汉武帝之时起,有三支经过河西走廊的人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第一支是以班超、霍去病、卫青、张骞等为首的军事集团;第二支是以求法僧为主的僧侣集团;第三支在他看来最为宝贵,那就是以高适、王昌龄、王之涣、王翰、岑参等诗人代表的文人集团。“在金戈铁马征服过的大地上,在满眼陌生的河山中,正是这些诗人,他们用原创的伟大力量,获取了边疆词语的不羁的想象,沿着河西走廊一路题诗作赋,歌吟不断。以诗人史,以史人诗,他们的

诗歌和漫游,想象和书写,其实就是那一个燃情岁月的主旋律和传播力之所在。”叶舟认为,边疆的大地上或许真正埋藏着我们这个民族最初的血性、勇敢、光荣和追逐,它是原创性精神性的存在。

再造文学与出版良性互动的灿烂景观

文学如何从个人化创作转变为社会共享的精神体验?出版功不可没。

谈到文学创作和出版的传播力问题,江苏省作协主席范小青直言,讨论这个话题,如同西西弗斯滚动巨石,“满是希望,又满是绝望,西西弗斯一直奋力地推动,然后再滚下来,再推动。”

范小青说,过去常说“内容为王”,但是内容富集的时代,渠道终端的话语权越来越大,它们有权挑选优质的产品和内容来源合作,于是渠道成为被仰望的稀缺资源,这就有了所谓的“渠道为王”。渠道常常是以“流量”来衡量一个产品的商业价值和投资价值。可问题在于,对于文学创作而言,票房、收视率、流量、点击量并不能成为评判内容优劣的标准。“流量可以成为衡量商业价值的标准,但是流量不一定能够成为衡量艺术价值的标准。”

范小青以“简约主义”大师、美国著名小说家雷蒙德·卡佛为例,说明优秀的文学创作常常是会被忽视或湮没的。卡佛生前一直活得很艰辛,物质的困苦一直缠绕着他,他要在一间借来的房间里写作,随时都可能停下手中的笔,因为他坐着的椅子随时可能被别人拿走。如此的写作环境和生存状况,使得卡佛非常节省文字,常常把一个复杂的家庭事件,只用两三千字,几页纸就写出来了。“把悲伤痛苦暗含在平淡的故事和语言之中,看过以后,你会觉得,没什么大事,但是心里很难过。这就是好小说的一种。这是一种新的语调和文学质地,就读者的阅读习惯而言,是一种挑战。”范小青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,作家无疑都希望自己的小说拥有更多的读者,可即便是优秀的严肃文学创作也很少会出现网络小说那样的“爆款”。就阅读维度而言,纯文学作品常常是很窄的,也正如卡佛所说:“选择当一个短篇小说家或一个诗人,基本就等于让自己生活在阴影里,不会有人注意。”

范小青说,目前,对于习惯了自谦、不擅长吆喝的传统文学写作者来说,出版几乎就是唯一的渠道。如果没有出版的渠道,作家只能关起门来“自嗨”。但仅有渠道还不够,渠道是否畅通,是否有足够的影响力、创新力、市场拓展能力,直接关系到能否将作家富有个性化的文学作品转化为有吸引力的、受众尽可能多的传播内容。这无疑需要渠道提升传播力。在她看来,出版社找准“适合”的作品很重要,针对不同的原创作品和不同的读者受众,需要采取不同的推广方式,将写作者们个人的创作,较大程度地转化为某种程度的社会共享。

“文学界最好的时期也是出版界最好的时期。”苏州大学教授、长江学者王尧深度剖析了文学与出版的渊源。他说,

文学和出版在时代的变化中其实在不断地形成默契,形成新的方向,正如今天在这里共同讨论文学,就是文学与出版一种高度的默契。他认为文学在关注外部世界的同时,同时应该能够反省自身,我们当下缺少对自己的文学世界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;出版不仅是积累、传承,还有创造。两者合力,当下或将“再造文学与出版良性互动的灿烂景观”。

“一个在偏僻乡间生活的人可能上不了网,外界对他而言就是一堵墙;而在城市生活的人,每天面对铺天盖地的信息,又何尝不是一种遮蔽呢?”河北省作协副主席胡学文认为,现实的丰富为写作者提供了无尽的素材,但若被遮蔽,写作者就是无翼之鸟。所以,写作者必须在众声喧哗中传递出具有辨识度的声音。而声音的传播离不开媒介,正如文学的传播离不开出版。尽管当下出版面临着种种挑战,但他坚信,阅读、出版与传播仍是人们“收获的征程”。

写作者的语言决定了文学的生长方向

谈到“传播力”,著名评论家、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格外看重的是语言。他生动地把文学作品比喻为孩子,指出在重视传播力的年代,出版界和文学界培育一部作品就像是在养育一个孩子。如何培育好这个孩子?张新颖从文学与语言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:“我们的现代汉语不过100年的历史,现代汉语在今天仍然处于成长阶段,处于变化阶段,它会成就什么样的作品,仍有待时间给出答案。100年前,江苏人赵元任翻译《爱丽丝漫游仙境记》,他考虑she要翻译成汉语里女字旁的‘她’,he要翻译成单人旁的‘他’,而我们今天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了。”因此张新颖认为,语言的使用者对语言和由语言荷载着的文学负有责任。

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庆祥看来,我们经常讲的传播力往往是平面的、流动性的过程,用数据表示,比如销量、粉丝、点击率。鉴于这种传播力,我们希望书卖得越多越好、作品点击量越来越多、被更多的人听到。但我们忽略了传播力还有另外一个层面,即垂直传播力,若作品要被未来的子孙读到,应该拥有另外一种行动、写作的方式。在这种垂直传播的语境下,需要我们非常谨慎、神圣地去想和写。

当然,在谈论文学传播力的时候,不能忽视的还有媒体的力量,其中,书评与文学出版的关系尤为紧密。评论家《文艺报》总编辑梁鸿鹰表示,书评专刊最重要的是保持专业品格,要坚守文学精神,同时也应该成为容纳文化议题的场域,最大限度地参与当今时代文化氛围和文学氛围的营造。催生更多优秀文学作品,做优做强文学出版,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,是书评的指归。

此外,媒体人、澎湃新闻文体中心总监石剑峰就10年来媒体对文学的传播作了分析,探讨了媒体对文学传播的推动等话题。

现代快报+ZAKER南京记者
陈曦 白雁 王凡
张鑫仔 姜斯佳
实习生 刘敏/文
赵杰 苏蕊/摄